

# 寒食缘起：从地方性到普泛化

陈泳超

历来对于寒食起源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虽然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子推说”和“改火说”两大派，但是其中的纷杂异说又琳琅满目，尤其对于改火与禁火之类的话题意见分歧严重，迄今尚无共识。其实，有关寒食起源的文献资料也就那么多，大家都在这些资料中翻新出奇，提供假说，某种程度上使得基本的文献推断也被淹没混淆了。本文依然立足于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资料，希望在细读文献的基础上，先确立一个从文献中可知的确实论断，以为各种假说建设一个有共识的平台。这一论断便是：寒食节俗缘起于以太原为中心的并州一地，它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到普泛化的演变过程。

—

目前所知隋唐之前关于寒食节俗的记载，主要就是如下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的 11 条（其中 I 虽有两条，因都处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且都很短，故归并为一）：

A.桓谭《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sup>1</sup>

B.蔡邕《琴操》：龙蛇歌者，介子绥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饵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其章曰：“有龙矫矫，遭天谴怒。卷排角甲，来遁于下。志愿不与，蛇得同伍。龙蛇俱行，身辨山墅。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沈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龙伍，愆不眄顾。”文公惊悟，即遣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

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

C.《后汉书·周举传》：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弔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周斐《汝南先贤传》文字几乎与此全同，乃《后汉书》所本。）

D.魏武帝《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夫子推晋之下士，无高世之德。子胥以直亮沉水，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云有废者，乃致雹雪之灾，不复顾不寒食乡亦有之也。汉武帝时京师雹如马头，宁当坐不寒食乎？且北方互寒之地，老小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书到，民一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俸一月。

E.西晋孙楚祭介子推文：太原咸奉介君之灵，至三月清明，断火寒食，甚者先后一月

F.东晋陆翊《邺中记》：并州之俗，以冬至后百五日有（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是今糗也。中国以为寒食。又作醴酪，醴煮粳米或大麦作之，酪捣杏子人煮作粥。

G.同上书：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

H.《晋书·石勒载记下》：（石勒末年）暴风大雨，震电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巨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光对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从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

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勒黄门郎韦謏驳曰：“……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并州复寒食如初。

I. 《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二月）辛未，禁断寒食。

（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

J.（东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介绍介子推事迹后）……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节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

K.（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炆、大麦粥。【原书注】按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之，则雨雹伤田。

上述文献资料 A、C、D、E，虽然在寒食节俗施行的时间上颇有差异，但是在空间上却格外分明，都集中于太原郡或并州地区（时并州下辖太原、西河等九郡），毫无异词！资料 B 没有说明地点，故略而不论。很多人（包括笔者的早年论文）据此确认，寒食节就是起源于太原郡，到了魏武帝时已经延伸至太原之外的其他三郡，显示了寒食节不断扩张的趋势<sup>2</sup>。这样的结论大致不错，只是稍嫌过于坐实了。A、C 明言太原郡，只能说明太原一定有，却不能表明太原之外一定没有。曹操的时候明明西河等其他三郡也有寒食节俗，但是晚于曹操的孙楚却仍然只提“太原”一地，可见文献列举的法则，是有相当弹性的。因此，笔者宁愿放宽些说，将寒食节俗归源于以太原郡为中心的并州地区。不过，无论如何，寒食节俗开始时绝非全国性的普泛节日，这是可以断定的，否则桓谭、周举等人何必要带着猎奇或惊讶的心态看待这个风俗呢？假如说周举是因为太原郡冬天寒食一月太过损折而震惊的话，曹操令文中所知仅为春天寒食一日而已，并且历数了施行寒食的很具体的四个郡。作为国家主宰，如果别的地方也有类似习俗，又怎么会对该地的寒食现象如此大惊小怪呢？这一论断在下述几条资料中也将得到反复证明。

大约到了东晋前后，这个节俗显示出了向并州之外扩展的趋势。资料 F、G 都来自东晋的同一本书，但所施行的时间和习俗上却颇有差异，可以确定的是仍然明确说明该习俗起于并州，麻烦的是并州之外有没有寒食现象呢？资料 F 说“中国以为寒食”，这话不太好确解，到底意思是“中国把并州的这些食物称为寒食”，还是“中国也把所谓的‘糗’来当作寒食吃”呢？如果是前者，表明寒食还只是并州地方习俗；如果是后者，则表明中国也有了寒食习俗。而资料 G 又明言北方在子推忌日照样“自作饮食”，这条倒可以更有力度地证明寒食开始确实只在并州一地实行，别的地方总是与之对立着说的。

但是资料 H 的时间也大致在东晋时期，却可以明确判断出寒食节俗已经超出并州一地了。因为石勒“去年禁寒食”后遭灾，结果议论下来，“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普复”二字非常关键，应该理解为“各地普遍恢复”，可见之前所禁的寒食，已经不局限于并州一地了。之后黄门郎韦謏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石勒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并州一地恢复寒食。这条转折阶段的例证，同样也充分说明着并州作为原发地的特殊地位。

资料 I 是北魏孝文帝的措施，所谓“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意思与石勒相似：介山所在之地可以继续寒食，别处就禁止了。可见除并州之外的北方其它地区也已存在难以禁断的寒食节俗了。资料 J 说得更分明：“中国流行，遂为常俗。”资料 K 则说明连南方都已经有了寒食节俗了。这几条都在南北朝时期。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寒食在东晋之前，只是以太原郡为核心的并州地方风俗，并非普泛性的节俗。大约在东晋前后该习俗开始向并州之外扩张，到南北朝时期，基本覆盖全国。这样的过程应该是可以明断的了。至于原因，我推测应该与五胡乱华时期人口流动现象剧增以及民族融合有关<sup>3</sup>。

## 二

在确立了寒食缘起于地方风俗这一标杆之后，学界普遍流行的“改火说”就很有商榷的余地了，因为“改火说”来源于《周礼》、《礼记》等书的记载，理论上

说，它应该是全国施行的国家礼制，其前提是普泛性的，它不能作为寒食节俗起源的因由，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对并州寒食节俗感觉如此奇怪了。事实上，与“改火说”相关的资料一共也就如下4条，其中存在着许多难以说通的问题，让我们来重新细读一下：

L. 《周礼·天官·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注】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时而以戒。

M. 《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为季春将出火也。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军旅修火禁。

N. 《周礼·夏官·司燿》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注】行犹用也，变犹易也。郑司农说以鄠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注】火所以用陶冶。民随国而为之。郑人铸刑书，火星未出而出火，后有灾。郑司农云：以三月本时昏心星见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故《春秋传》曰：“以出内火。”时则施火令【注】焚菜之时……凡国失火、野焚菜，则有刑罚焉【注】野焚菜，民擅放火。

O. 《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焚也。【注】谓焚菜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sup>4</sup>

对于这样4条资料，有很多信息值得探究：

#### （一）关于“改火”

这几条材料中明确在说改火的只有“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这一句话，但是如何理解还成问题，到底是一年四季都必须分别改火呢？还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改火？我们来看关于改火的最早记录，《论语·阳货》曰：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sup>5</sup>

照此说来，改火是每年进行一次，就像谷物一年一熟一样，并非四季都必须改一次。《管子·禁藏》又说：“当春三月，萩室煨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sup>6</sup>但是这两条似乎不能连起来阅读，不能表明每年三月份改火是一种定制，因为前面明明说了“四季变国火”，显然未必一定要在春季，《后汉书·礼仪志上》就记载“日冬至，钻燧改火云”<sup>7</sup>，分明可证。至于郑玄注释中引用的邹衍所谓五季从不同的木料上改火，那是五行家的说法，恐怕是相当后起的了。

因此，关于改火，可以比较确定的信息应该是：早先是一年改一次，但是何时改火并无统一规定。具体到底怎么改，就非常模糊了。

## （二）关于“修火禁”和“出内火”

首先，一个非常明显的语序问题被很多人忽略了，在L-O这4条资料中，都说的是“火禁”，根本没有说到“禁火”。这个语序问题是有很大的质性差异的。“火禁”的意思更多是指防火措施，未必一定要禁止用火。而修火禁的时间，主要在春秋二季的最后阶段，这时候正是干燥容易发生火灾的时节。郑注所谓：“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野焚莱，民擅放火”等，说得已经非常明显，像烧田这样的活动是要非常谨慎的。关于这一点，杨琳书中说得非常分明：“它既没有不准人们生火做饭的意思，更与钻燧改火风马牛不相及。”<sup>8</sup>

比较麻烦的是“出火”、“内火”到底什么意思呢？所谓“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字面意思是说为了与大火星的出没相对应，人间的用火也要在季春才开始，到季秋就结束，也就是说，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是不能动火的。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显然不可能指食用之火，否则半年寒食，匪夷所思。郑注说是：“火所以用陶冶”，他并以《左传》上的一条理论、一件实事为证。一条理论是襄公九年士弱所言：“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为鹑火，心为大火。”这说得比较抽象，没有明说到底出内什么火；一条实事却很分明，昭公六年三月，郑国铸刑书，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sup>9</sup>《左传》用周正，《周礼》用夏正。此处的三月，相当于夏历正月，时当孟春，不应出火，郑国却铸刑书了，所以最后会得到火灾的惩罚。可见，所谓的出内火，指陶冶之火是要用半年歇半年的。

不过，这个出内火的情况还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些记载表明在该出火的时候却

要禁火的，比如《后汉书·礼仪志上》：“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sup>10</sup>又有记载说季春禁火是为了烧田的，比如〇条所示，不过该条汉代以来就多有争论暂不深究。

那么这个“出内火”与“修火禁”是不是一回事呢？照情理上说，陶冶大火，确实比较容易引发火灾，所以看做一事，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既然季秋已经“内火”了，那么仲春又何必专门要为之“修火禁”呢？不是整个半年都禁用陶冶之火吗？总之，关于“修火禁”与“出内火”，现有资料不多，却很芜杂，难以得出确凿的信息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怎么看，它们都跟民众食用之火无关，所以不能作为寒食习俗的起因。

可是，《荆楚岁时记》的注释就开始把寒食与所谓周制禁火联系起来：“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通常认为该注为隋代杜公瞻所作，侯思孟在《中世纪早期的寒食节》里指出，这种把寒食与禁火联系起来的观点，是与隋代王劭等人希图恢复改火古制的努力大有干系的。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又与历来学者好古之性非常契合，所以至今依然为人乐道，颇有习非成是之嫌。

有一个疑问必须面对，前引《后汉书·周举传》有所谓“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之语，唐李贤注曰：“龙星，木之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照此解释，似乎早在东汉太原郡的寒食习俗中已经混杂了“子推说”和“禁火说”两种因由了，这也是“改火说”（在这点上也可以称“禁火说”）最有力的证据。但细读原文，却可知并非如此。首先，《后汉书》原文说的是冬天寒食，可李贤注的龙星之忌，说的却是春天的事，二者难以合拍，这或许有版本的讹误（参见裘锡圭先生《寒食与改火》一文的校勘）；但从文理上细细体味，在“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这个貌似二说并存的语句之后，紧接着原文就说：“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其后周举革俗，也单单“作书以置子推之庙”，始终都只说介子推之事，根本没有涉及龙星。那么所谓“龙忌之禁”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早年文章《寒食节起因新探》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完全可以把“龙忌之禁”当作介子推传说的一部分，当时的相关传说中，经常

有所谓龙蛇之歌，就是把晋文公比作龙，所以此处的“龙忌之禁”，可以解作晋文公有所忌讳的意思。但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却提供了一条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按《淮南·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注：‘中国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sup>11</sup>王氏明确断定此处的“龙忌之禁”只是为了忌讳介子推的亡日。不过查今存《淮南子·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云：“中国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sup>12</sup>并没有确凿说是“鬼神之亡日忌”，只是含糊地说“鬼神之事日忌”，一字之差，还是大有分别的。王应麟与高诱相去近千年，加上古籍辗转抄录的讹变，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王应麟的解说，尽管这样的解说是我们期待的。但是，《淮南子》高诱注的这条“孤证”提醒我们，或许这是日忌之类术数知识系统的专门用语，如今，随着考古发现了许多日书类文献，本文正可续为之证。

在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中，我们可以择取这样几条秦简文字：

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禾忌日，稷龙寅、秣丑。稻亥，麦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种之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睡虎地《日书》甲种）

取妻龙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睡虎地《日书》甲种）

五谷良日，己        出种及鼠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子，亦勿以种。五谷龙日，子麦、丑黍、寅稷、辰麻、申戌叔、壬辰瓜、癸葵。（睡虎地《日书》乙种）

祠户日，壬申，丁酉，癸丑、亥，吉。龙，壬辰、申。（睡虎地《日书》乙种）

很明显，上述诸条中的“龙”字，是“良”和“吉”的反义词，而与“忌”为同义词，组词功能也一样，比如上述与“良日”对立的是“龙日”，也可以替换为“忌日”，请看下例：



羊良日，辛巳、未，庚寅、申、辰，戊辰，癸未。忌日，甲子、辰，乙亥、酉，丙寅，丁酉，己巳。（睡虎地《日书》乙种）<sup>13</sup>

可见，在日书的术语体系中，“龙”、“忌”完全同义。至于个中缘由，尚不能晓；被人经常引用的《墨子·贵义》的一段记载，或许能够透露一些消息：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sup>14</sup>

由此可以断定，《后汉书·周举传》里的“龙忌之禁”，确实只是为了介子推，而与龙星无关。李贤以来的误解，是对于日忌术数语境的隔膜所致。

### 三

本文强调寒食缘起的地方性，同时也带出了寒食缘起的因由问题。事实上，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所有关于寒食的早期记载，都归因为纪念介子推，无一例外。只是到了杜公瞻以禁火来解释寒食，才开始否定“子推说”，其后力主“改火说”者，均仍其绪余而另加阐发，他们的共同观念是：既然介子推传说不是历史真实，那就不应该成为节俗的缘起因由。

这一点，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里的相关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已经看到了改火的普泛性与早期寒食地方性之间的裂隙，但是仍然主张“改火说”，认为改火仪式时间上有长短之分，“间隙短的地区无寒食，间隙长的地区有寒食”。这样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是很勉强的，为什么只有并州一地改火间隙长呢？难道他们的取火技术特别笨拙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间隙长到要寒食的地步，一定另有原因，并非改

火一词可以涵盖。杨琳同时表示：“平心而论，虽然改火说目前还只能认为是一种推测，但它毕竟要比虚构的介推说合理得多。”<sup>15</sup> 笔者对此不能同意，节俗的来历未必依赖于历史的真实，民间自有独特的合理性理解，不需要与学者的理性重合。比如七月七乞巧的习俗，现可知的文献表明，它是产生于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之后的<sup>16</sup>，可见由传说衍生出节俗，正是民间节俗的常例。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

不过，本文也无意于断言寒食节俗就一定起源于子推传说，它也可能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由，李道和在《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sup>17</sup>的寒食章节中，就提出了一种“求雨说”的新解，其根基并不比“改火说”薄弱，尽管笔者也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此不赘论。即便笔者早年所提出的“山戎说”，因证据尚弱而无人响应，却也似乎未必完全没有容身之地<sup>18</sup>。

总之，“改火说”、“求雨说”、“山戎说”等等都只是未经证实的假说，在不能证明寒食习俗早于介子推传说的前提下，我们依然无法否定传说与习俗的紧密关系甚至因果关系。但是寒食节从地方性向普泛化发展的历史途径，却应该成为各种假说共同的基点和平台。

这样的观点侯思孟在《中世纪早期的寒食节》里早就有了类似的表达，本文虽然在切入视角以及很多细部与之颇有出入，但大旨却是一致的，故特意引录他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以表达对于先贤不敢掠美的敬意：

目前我们已读到了现存的有关寒食的所有文献，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举行的。但他们提出的日期并不一致，从盛冬至冬至后105天，到阴历五月五日都有可能。不过他们清楚的显示了地理上的扩散过程：从太原附近到整个山西省，最后是全中国。寒食节时所吃的食物随各史料的记载及地点而有变异，但是所纪念的对象是一致的。从最早到最晚的记录看来，寒食的目的是要纪念一个当地的英雄人物——介子推。

1 本文所有引文除特别交代版本信息者外，均转引自裘锡圭先生《寒食与改火》一文（收于裘先生

《文史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该文是目前所见相关论文中文献功夫最值得信赖的。特此向裘先生表示谢意。

2 见侯思孟（Donald Holzner）：《中世纪早期的寒食节》（杨玉君译，台湾《民俗曲艺》第 100 期，1996 年 3 月。本文承杨玉君教授惠赐译稿，特此鸣谢）；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 年第 3 期）；陈泳超：《寒食节起因新探》（《晋阳学刊》1991 年第 5 期）。

3 张勃博士未刊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和寒食节的南传》，对此问题有专论。

4 上引 4 条，分别见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657 页、885 页、843 页、1450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5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 188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6 戴望：《管子校正》，第 291 页。《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1991 年版。

7 《后汉书·礼仪志中》，第 3122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8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第 193 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版。

9 上引二条见《十三经注疏》第 1941、2044 页。

10 《后汉书·礼仪志中》，第 3122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此条李道和书中先引用了。

11 见王应麟著、翁元圻注：《困学纪闻》第 1053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此条幸得张勃博士提醒，特此鸣谢。

12 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第 370 页，《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1991 年版。侯思孟引述此条时云为许慎注。

13 上引五条日书资料，分别见于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 33、108、191、198、196 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年版。

14 孙诒让《墨子间诂》第 270 页，《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1991 年版。

15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第 197-198 页。

16 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晋，而乞巧风俗的最早记载要到南朝，见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第 242-243 页，台北：学生书局，1988 年版。

17 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8 见陈泳超：《寒食节起因新探》。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